

中国“和平崛起”的民族传统性格分析^{***}

□赵海月 [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

□宋晓玉 [北京大学 吉林 132013]

[摘要] 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培育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主静、求和、向善、知足、容忍、中庸和好施等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使中华民族在国际交往和对外行为中一直具有安分守己、乐善好施、宽容大度、热爱和平等优良品性。丰厚悠久、生生不息的中国文明蕴涵着“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为万世开太平”的天下主义精神。“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是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国际战略选择。历史将证明:中国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关键词] 和平崛起; 民族传统性格; 文化精神; 中国永远不称霸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5)03-0045-04

所谓民族性格,亦称作“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它是了解一个民族活动特性的最重要概念。国民性作为民族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长期生活积淀而成,它决定民族活动的能量导向,包括整个民族的思想方式、情感意向、审美态度、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性的基本取向。由于国民性构成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因而具有相对稳定的固滞性。只要国民性不发生大的改变,那么该民族将不分朝代、一以贯之地进行富有民族性格特色的社会活动,其中包括对外关系中的交往与行为。

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古训,反映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渴望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良好愿望和深厚文化底蕴。”^[1]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作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第一次向外界清晰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为未来的中国角色定位,并用很大篇幅谈论孔子“和而不同”的观点,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角度诠释了中国外交新战略,形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外交战略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就国际战略的价值取向而言,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属于和平型而非称霸型。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并不在于它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奉行怎样的对外政策。^[2]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和平崛起”和永远不称霸有着深层的文化因子,即由中国传统文化特质所造就的特有的民族性格决定的。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其鲜明的性格特征为世界所关注。安分守己、乐善好施、宽容大度、热爱和平等始终是中华民族在国际交往和对外行为中的品格操守和价值取向。对此,我国早有诸多的学者进行过论述。笔者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中西民族传统性格比较的基础上,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精神和环境与人相一致的原则,概括了中华民族具有主静、求和、向善、知足、容忍、中庸、好施等传统性格特性;与此同时,对中华民族传统性格与对外行为取向这一问题作出评判与阐释。

一、主静

中华民族的主体一开始就属于农耕民族。农业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养育了中华民族具有以静为主的性格。长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使先民们无须或很少进行商品生产与交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甚至达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加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相对于欧洲而言,一直是在比较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的。四周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和辽阔富饶的土地,使古代中国一开始就选择了“以农立国”的道路。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汉人所追求的是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定。这与游牧民族以征服为荣耀的心理大相径庭;与以商品交换和海外殖民为致富手段的海上民族,对外拓展的意向也判然有别。一些游牧民族如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一些海上民族,如古代的罗马人,近代的英国人、日本人,多次制定过征服全世界的计划,而在中国汗牛充

* [收稿日期] 2005-03-21

** [作者简介] 赵海月(1963—)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宋晓玉(1973—)女,北京大学马列思想政治教研部讲师,法学硕士。

栋的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可以发现我们的先民有过‘兼爱非攻’、‘礼运大同’之类美好的理想或奇妙的幻想,唯独难以找到海外扩张、征服世界的狂想。这大概只能用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大陆——海岸农业民族平实、求安定的文化心理加以解释。”^[3]由此看来,“主静”的传统性格,使中华民族在对外关系中很少有攻击性和扩张性。

二、求和

儒家的和平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对外行为取向具有深刻的影响。孔孟从“仁”的人道主义原则出发,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和平相处,并通过实行仁政的和平竞赛统一天下。孔孟坚决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侵略兼并战争和争夺霸权的相互残杀。因为这些都不符合以爱人为核心的仁的原则。在二千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孔孟所憧憬的“仁”的政治理想,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那里,人们过着富裕快乐的和平生活。真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己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儒家的和平思想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从而铸成了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上看,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民族。气势磅礴、绵延万里的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而在对外意义上,它则是抵御进犯、抗击侵略的文化象征。

三、向善

农耕民族的生存前提是靠天吃饭。科学技术的原始落后和生产力水平的初级低下,使先民们对年景无常的大自然既恐惧又崇拜。久而久之,他们就觉得似乎在冥冥之中有一种驾驭自然与人生的力量主宰着人间的吉凶祸福。于是,先民们便选择以善行的方式来感动神灵,求它们赐给风调雨顺,求它们保佑家人平安。于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便成为中国民间崇尚的信条。这种民族心理延伸到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上,便是“亲仁善邻”与“协和万邦”。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作中西民族性格对比时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虽然人口多、资源丰富,但却不会对外国造成威胁。他们不像白人那样,喜欢虐待其他人种。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以公理为基础而不是以武力去解决争端。”^[4]可见,中华民族向善的传统性格,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予以承认的。

四、知足

中华民族传统性格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知足”。知足心理是小农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小农经济最为发达,因而中国人的知足心理也最为显见。中国的“乐感文化”迥异于西方的“罪感文化”。中国人对人生和未来经常抱有一种乐观态度和美好预想,而不像西方人那样为求精神的超脱,终生怀有“原罪”感和习于忏悔。“知足常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使中国人形成了安于天命、与世无争、保守温和的性格特质。这种性格特质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则是对他国或世界不怀有贪婪觊觎之企图。在这方面,16世纪末长期在中国居住的意大利杰出的传教士利玛窦曾有过深刻的感触。他说:“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君主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5]可见,中华民族不非份、不好战、自足自安的特性是区别于西方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容忍

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两千多年间,在我们栖居的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1029次大水 and 1056次大旱。即使到了今天,在国土面积大于700万平方公里的6个国家中,我国的自然环境也是劣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的。例如,我国65%以上的国土面积是山地丘陵。西部几乎都是山地、丘陵和高原;33%的国土面积是干旱荒漠区;70%的国土面积每年遭受东亚季风的强烈影响,稍有异常,不是水灾就是旱灾。另外,还有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存和生活;17%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这是全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此外还有,中国大陆海拔平均高度是1470米,而世界大陆海拔平均高度则为830米。根据数学模型的数据分析,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发展成本(特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是1.25:1,也就是说在中国建设和发展需要比世界平均水平多出1/4,中国发展成本的难度系数大大高于世界其它国家的平均水平。就是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下,中华民族以其坚忍的韧性求得了生存与发展。《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箴言和久传不衰的“愚公移山”的寓言,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精神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愈在挫折厄运面前,愈能激起抗争的勇气和力量;二是它经常以不张扬的方式和忍者的态度来进行顽强的拼搏与深沉的战斗。

在漫长的历史中,除了艰苦劳累的农业生活外,还有残暴的君主专制和扼杀个性的家族制度等,使中华民族练就了无与伦比的忍耐力。他们总是把痛苦内化,以忍让的方式来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矛盾的解决。在中国有许多格言警句都反映了这一点。如:“忍为贵,和为高”;“小不忍则乱大谋”;

“难得糊涂,吃亏是福,退一着让一步当下心安,非图事后福报也”;“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求和是妙方”;等等。“容忍”的民族性格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则是被动地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纠纷。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华民族能容则容,能忍则忍,只有到了“忍无可忍”或“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才实施自卫反击行为。美国政治学家纳森·阿德尔曼研究了1840—1980年中国卷入的11场战争和军事冲突。他认为中国使用武力来解决矛盾和冲突的目的与西方有很大区别。他认为:对中国来讲,“战争主要不是获得领土、击败敌人或者取得权力。即使战争用于威慑敌人,威慑效果也难以解释战争的动机。战争主要是用于表示决心,使敌人难堪,惩罚或自卫——完全是传统的中国观念。”^[6]中国人历来主张“师出有名”。为了保证使用武力时在道义上占据有理地位,中国总是到了最后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仍然单独奉行“不打第一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对外政策。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六、中庸

“中庸”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是一种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和而不同”、“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融矛盾、避免冲突、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中庸之道”即“中和”的思想方法,其中的“中”是指把握事物度量的准确性,而“和”则是指不同因素、不同方面的合理组合与对立统一。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来说,“中庸”这一范畴是贯彻其理论学说的根本基础。“《易经》八卦的本义是中庸、孔子儒学的真谛是中庸、老子理论的核心是中庸、甚至庄子思想的倾向也表现为中庸。”^[7]在中国的先哲们看来,“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庸”哲理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便是调和折中,中国常以此作为为人处世的信条。在“中庸”理念的濡染下,中华民族具有化解矛盾与冲突的“和合”智慧与“绵里藏针”的性格。这种智慧和性格转运到对外关系上,则是“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方针的制定与实行。

七、好施

中国传统政治积极推崇“王道”而坚决反对“霸道”;中国人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思想,但又有惠任于人而不独享的民族风范;民族大众尊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礼仪,同时又遵循“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准则;等等。中华民族慷慨大度、乐善好施的品性是世界有目共睹的。历史可以作证。中华民族曾辉煌过也曾屈辱过。“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8]而进入近代,中国却沦为任人宰割的“双半”社会。当中国在强盛之时,“贡献给世界的是《易经》、《论语》、《孙子

兵法》、《永乐大典》,是世界最早的《甘石星表》、地动仪、浑天仪,特别是被人认为‘推翻整个旧世界’的四大发明,以及从都江堰、万里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赵州桥等工程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的智慧和品格。”^[9]而当中国贫弱时,西方列强又给了中国什么?只有欺凌、压榨与痛苦。据统计,从1842年至1949年,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1000多个,割地150多万平方公里,总计赔款达十九亿五千三百多银元。而被疯狂掠夺的财富和战争造成的损失尚未计算在内。从1405年至1443年的38年里,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他没有利用处于绝对优势的船舰观众去侵略扩张,“而是向所到之处的居民传播中国的文明,送给他们工具、种子、书籍、器皿、绸缎等。”^[10]40多年后,哥伦布远航发现北美新大陆,带给世界的却是资本的血腥和殖民的狂潮。一些西方学者曾就古代中国实行过“朝贡制度”来说明中国在历史上也有过对外称霸的表现。这种观点是荒谬的。“朝贡制度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诸小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他们的声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他们的贵重礼物,多于他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予他们以某些贸易特权。”^[11]显然,中国的朝贡制度并不具有武力征服与经济掠夺的色彩,这与西方所熟悉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根本不是一回事。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已经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2]中华民族惠众好施的传统美德承载着这样一个雄浑的论断:中国越强盛,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对人类做出的贡献就越大。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传统显然具有一脉相承性。“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13]丰厚悠久、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蕴涵着“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为万世开太平”的天下主义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由此观之,“中国威胁论”实属无稽之谈!

霸权主义是大国或强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运用各种手段对其它主权国家进行控制、干涉、欺侮和支配,以谋求对某一地区或全世界进行统治的政策和行为。国际政治的逻辑表明:凡是搞霸权主义的,必定是大国或强国;但反过来,大国或强国并不一定搞霸权主义。如中国在汉唐时期曾是一个“超级大国”,但中国并未搞霸权主义。究其原因,根本性的价值取向因素则是民族文化的特质所孕育的民族传统性格使然。“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4]“如果中国人采纳西方人的人生观,那么,当他们有能力抵御外侮之时就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4]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孕育着“和为贵”的基因,中国人和外界相处信奉的是“以德报怨”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而美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则不同,以个人主义为精神内核的美国文化蕴藏着霸权主义的毒素,而且国力越强,则毒性越大。”^[14]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在古往今来的国际交往中,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誉。

中华民族曾经饱受外来侵略之苦,深知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万分珍惜和平的可贵。中华民族决不愿再回到过去那样的屈辱地位,也决不愿把任何其他民族置于我们过去那样的可悲境地。“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是中国不称霸的国际战略选择。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12]

参考文献

- [1]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2-04-11.
- [2]赵海月.国际战略思想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 [3]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4]柏特兰·罗素.中国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 [5]金德湘.中国的和平外交传统与西方的“黄祸论”[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11):12-16.

[6]乔纳森·阿德尔曼等.象征性战争:1840-1980年中国使用的武力[M].台北: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1993.

[7]陈建远.中国社会——原型与演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8]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9]霍英东.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J].新华文摘,1996,(1):11-15.

[10]阎学通.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J].现代国际关系,1995,(8):23-28.

[1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4]赵海月.中国政治分析:视界与维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

Analysis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Characters of China's Peaceful Rising

ZHAO Hai-yu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SONG Xiao-yu

(Beihua University Jilin 132013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s traditional characters is trained by its traditional way of living and working. Calm, harmony, kind, feeling at ease, tolerance, moderation and generosity are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s. It is well-known that Chinese people are always keeping the virtues of behaving himself, accommodating, generosity, loving peace when they contact with foreigners in foreign affairs. Long and vivid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tains the spirit of cosmopolitanism and pursuing peace. China's peaceful ris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China an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world, is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hoice of never taking hegemony. The history will testify that China becomes more powerful, the world peace will be more guaranteed.

Key Words China's peaceful rising; national traditional character; analysis; China opposing hegemonies forever

·学术广角·

国内外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述评

周湘莲、梁建新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2005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其全球实践之间形成的悖论使之遭到了众多的批判,西方左翼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发展历程、当代霸权及其与全球化、第三条道路的关系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探讨了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相关路径。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视角众多,辞锋犀利,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他们研究和批判的着眼点仍然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前途与命运的关注,是以批判性话语为资本主义克服危机出谋划策,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不少民族与国家利益的考虑,打上了其自身的阶级、经历的烙印。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从我国的实际国情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批判新自由主义。更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左翼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暗含着潜在的危险。

中国学者在借鉴新自由主义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对新自由主义批判集中在3个维度上展开:一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误区与局限性的批判;二是对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俄罗斯等地的实践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的批判;三是对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导作用进行批判。但是,中国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还很不到位,主要表现为批判靶子不准,缺乏深刻而系统的意识形态批判。国内外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批判性研究既为进一步认识新自由主义提供宝贵的思想养料,又留下了继续耕耘的空间。

·宣文·

中国“和平崛起”的民族传统性格分析

作者: [赵海月](#), [宋晓玉](#), [ZHAO Hai-yue](#), [SONG Xiao-yu](#)
作者单位: [赵海月, ZHAO Hai-yue \(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 [宋晓玉, SONG Xiao-yu \(北华大学, 吉林, 132013\)](#)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5, 7 (3)
被引用次数: 2次

参考文献(14条)

1. [江泽民](#) [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 2002
2. [赵海月](#) [国际战略思想研究](#) 2002
3. [冯天瑜](#) [中华文化史](#) 1990
4. [柏特兰·罗素](#) [中国问题](#) 1996
5. [金德湘](#) [中国的和平外交传统与西方的黄祸论](#) 1997 (11)
6. [乔纳森·阿德尔曼](#) [象征性战争:1840-1980年中国使用的武力](#) 1993
7. [陈建远](#) [中国社会——原型与演化](#) 1988
8.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 1988
9. [霍英东](#) [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 1996 (01)
10. [阎学通](#) [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 1995 (08)
11.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1992
1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1993
13.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2002
14. [赵海月](#) [中国政治分析: 视界与维度](#) 2004

引证文献(2条)

1. [王传玲](#) [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新时期中国和平崛起的解读](#) [期刊论文] -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1 (5)
2. [王燕](#), [龙立荣](#), [周浩](#), [祖伟](#) [分配不公正下的退缩行为: 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的影响](#) [期刊论文] - [心理学报](#) 2007 (2)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503013.aspx